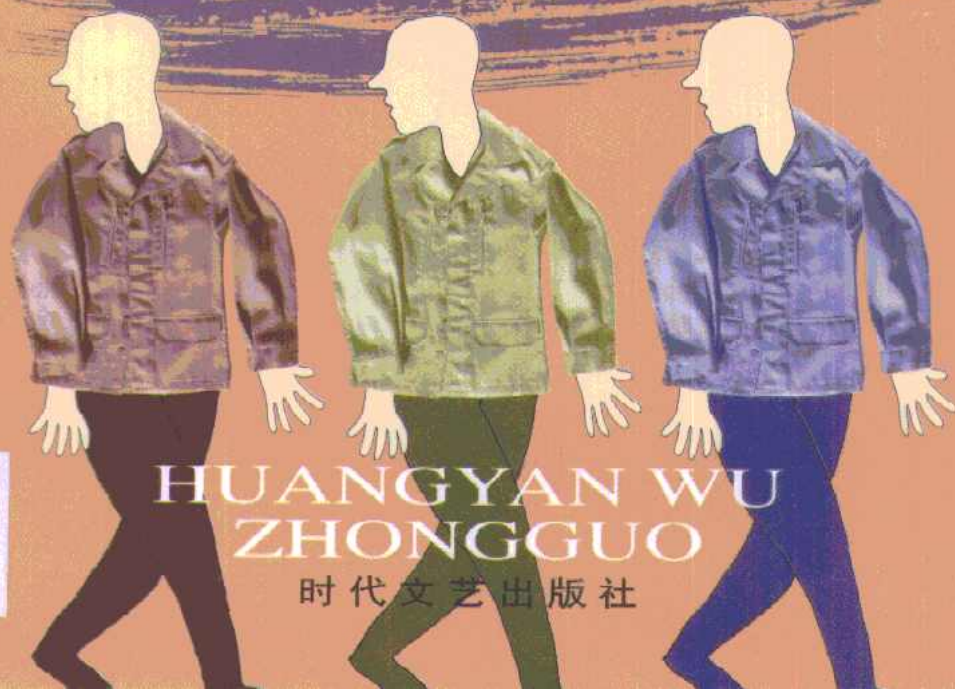


谎言 误 中国

钟 敏 / 编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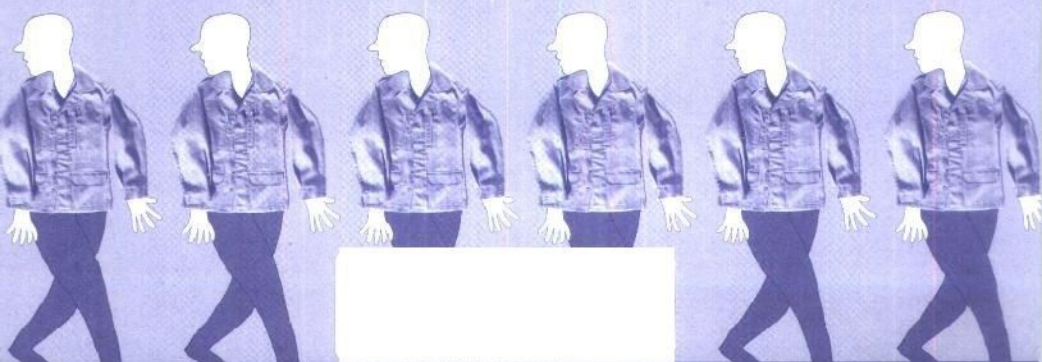
HUANGYAN WU
ZHONGGUO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D669
Z69

谎言 误 中国

钟 敏 / 编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序 言

假做真时真亦假,真做假时假亦真。

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,雄文汗牛充栋,豪识堆积如山,泱泱之国粹影响着整个地球村的精神意识,卓文识见,令人拍案,使得东西两半球无处不散发黄河文明的浓烈气息。

——这是人类的财富,是我们的骄傲与自豪,也是我们在落后时津津乐道的荣耀。

然而,五千年沧桑巨变,五千年谎言不断,当沉重的谎言在黄河岸边安家落户,四处弥漫时,我们尚不能看清它的毒害,感受不到它纵情的侵蚀。这不是我们作为现代文明人的悲哀吗?更有甚者,张大嘴巴,做虔诚状,吮吸着“谎言”,传播着谎言,不自觉地充当了谎言的俘虏和帮凶。他们吸收谎言不说,还要把谎言散放到明净的地区去,目的何在?无非使更多的人成为谎言的信徒。“谎言”成了动物,如风如雨,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

声”。谎言传播处,曲终人不散。

谎言声中,一切真诚的东西都变得苍白无力。如果说秦朝时的赵高把一匹鹿赶到朝廷上,把它说成马,把那些不说鹿为马的大臣统统斩首——这是具象的谎言,是低级的谎言,那么到了三国时的曹操就进了一步——他的“望梅止渴”的故事往往可以得到人的谅解,甚至佩服。宋朝的赵匡胤就更为高明,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,在一片谎言声中当了皇帝。谎言高明,而外族人不听这一套,辽兵北犯边关,西夏人起兵叫板。美丽的谎言欺骗的只有自己人,自欺而欺不了外族人。赵氏江山本来就不浩大,很快被金兵向南赶走,由北宋赶成了南宋。后来,成吉思汗的铁骑杀进了中原,南宋只有灭亡。

再看成吉思汗酿造的元朝帝国,游牧民族不知道谎言,拒绝谎言。他们一个弱小民族可以驰骋世界,践踏广阔的欧亚大陆,向西打到多瑙河流域,使多少后代人不断回味那段激昂的故事,那曲美丽的传说。当然,强大的元朝终于没有“脱俗”,没有走出由强到弱的“规律”。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,谎言占有很大的比例。谎言致使腐败有了滋生的沃土。

到了明代,乞丐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,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制造者,找个美妙的谎言来个火焚庆功楼。这倒不是我们所扼腕叹息的事。令我们叹息的是郑和下西洋以后,明朝统治者让我们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时机,使中华民族与富足、强盛的新世界擦肩而过。这一遗憾也是一个谎言社会的必然结果。

明代的统治者尝到了与宋代统治者如出一辙的尴尬命运。朱元璋没有听懂刘伯温对他的委曲忠告，明朝完蛋了，依然被来自北方的弱小女真民族所灭。西至嘉峪关、东到山海关的万里长城没有阻挡住清兵入关。原因不在吴三桂、李自成等人，没有他们，历史也会如此。

这也是中国的幸事，大清帝国粉墨登场了。

雄浑的大清帝国强盛百年以后，终于在一派谎言声中敲响了丧钟，这一次给这片东方古陆带来的灾难更为惨重。八国联军焚毁了一个圆明园，也为中国几千年谎言的持续泛滥找到了最后一片废墟。废墟是一种提醒，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警戒。谁都希望它是最后谎言的归宿，谁都希望从此天下真诚起来，令谎言无处藏身，无地自容。愿望多好，现实多残酷啊！

封建社会最后的谎言会就此灭掉吗？

也许，封建社会里的许多东西可以彻底绝迹，而“谎言”却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它极大的生命力寄托在一片喜欢谎言的国土上。或许因为谎言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大大麻痹了我们的判断能力，我们的“民主、民权、民生”为谎言所盗用。试想，在“三民主义”的幌子下，国民党在大陆几十年究竟干了些什么？

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。”新中国在毛泽东伟大的声音里站立起来了。

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在闭关锁国状态里似乎没了声音，没了纷杂的“争吵”。它只有一种声音，这惟一的声​​音如果成了谎言，岂不更为可悲、可怕？“十年文革”成了一个对文

明之邦的巨大嘲讽。它以一个巨大的谎言吞去了更多的谎言。一个叫张志新的女子想说几句真话,被人扼断了喉管,可怕不可怕!

它成为可怕的真实的谎言!

当古老的中国用小小的乒乓球撞开国门时,时代是前进了。然而有些人已习惯谎言,反而认为真实的声音是虚假的了。说假话泰然,说真话心跳脸红。某些人真正领悟到了“弄假成真”的“魅力”。中国,在某些时段里不欢迎真实的存在。

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”礼仪之邦的中国人,渴望真诚,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国度里。中国人需要一种自觉的清醒意识,迫切需要一种召唤,一种经常性的提示。因为历尽沧桑的某些中国人已经有些麻木了。他们的麻木主要表现在轻信和服从上。这种可怕的麻木也导致他们失却了华夏祖先遗传的叛逆的血性。他们乐意生活在四四方方的小四合院,乐意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,他们不再有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感叹,他们的头脑趋于懒惰。

思考是痛苦的,思考出的问题又是痛心的,这种问题又得不到解决,那会是什么滋味儿?

我们要识破谎言的漂亮外衣,充分认识到谎言丑陋的本质及毒害。这是需要勇气的,需要一种牺牲精神的。

面对美丽的日渐完善的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谎言,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他人,也许他人也是谎言的传播者与受害者。二十一世纪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。我们所有的人

都应横眉冷对谎言,使那些出自某些报纸、杂志、书本、电视等渠道的谎言现出它们狰狞的本来面目来。我们要拿出勇气,去呐喊,去揭穿,去痛打。让我们生活的空间里,显现出本来的真实与真诚来。

因为有虚假,我们召唤真实。因为有邪恶,我们召唤正义和善良。因为有丑陋,我们召唤完美。

面对谎言的浮动,我们亮出的除了真实的声音,还有锋利的武器。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微不足道,但世界的明天总归为真诚和正义所占领。

再美妙的谎言都是只能烘托出真实的伟大来。战国时的大才子宋玉的《登徒子好色赋》,论包装,可谓美文,但其目的是攻击老实人登徒子的。宋玉自豪地说,天下的姑娘数他们楚国姑娘最美,而楚国的姑娘又数他们家乡的最美,他家乡的姑娘又数他邻居家的姑娘最美,而邻家的姑娘趴在墙头盯了他三年,他一点不动心。这真实不真实先不去说,有时人为了说自己的高尚,可以撒弥天大谎的。宋玉说登徒子娶的老婆丑陋无比,登徒子却与她一连生下五个孩子来……宋玉的目的是中伤别人,结果是扇了自己一个耳光。他一不小心就赞扬了登徒子忠贞不渝的爱情。谎言的尾巴总是掩藏不住的,总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,各种思潮汹涌而来,谎言再度膨胀,再度成为我们生活中必须应对的话题。正像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空气、阳光一样。我们生活在必须面对谎言的环境中。别人可以把晴朗的天气说成阴

雨连绵,你在屋子里是否相信?而人又不愿意走出大门,这怎么办?本来电费每度只有三毛,收费人告诉你是六毛,你又是什麼态度?

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,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我们的祖先在谎言声中四处喋血,要的是后来人生活美好,要的是后来的社会充满真诚。可是如果他们灵魂不灭,从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里窥视到我们如同戏剧舞台的交易场所,听到一派虚伪之声,他们会瞑目黄泉吗?

我们不会忘记,当中国只有一种声音唯我独尊时,社会可以一夜间赶超英美,乘风破浪,提前跨入“各尽所能,按需分配”的共产主义。贫瘠的庄稼地里可以卫星上天,可以亩产几万斤粮食而不脸红。在那个“反右倾”的年代里,中国的浮夸风此起彼伏,互不服输。当人人呼喊粮食产量跨长江,过黄河,毛泽东发愁“粮食怎么吃得完”时,上帝跟中国开了个玩笑,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突然降临,一时间百姓饿死了几千万,乞讨声声入耳。但真诚的百姓们仍然忘不了救星毛泽东,仍然挨着饥饿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……那场面既苍凉又可悲。

到了今天,喜欢反思的中华民族似乎健忘起来,刚改革开放二十年,谎言又有了新的市场。

中国体育界刚搞了几年甲 A 足球联赛,马上自我感觉良好,结果一次次折戟沉沙,铩羽而归,只能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推到下个世纪去完成了。

中国文学是有悠久的历史,而新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才有几年?就有人为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怨天尤人。

不少作家是捧出的,一会儿“新写实”,一会儿“新状态”,一会儿“新生代”,一会儿新“××”,就连歌星、笑星、影星都写书了!市场在捧谁?市场又在害谁?

这样的浮躁与热闹,喧哗与骚动,能出莎士比亚、马尔克斯式的大作家?能出《红楼梦》式的大作品?

歌星可以包装而出,连歌谱都不认得。影星可以包装而出,找人配音。社会大舞台的谎言纷至沓来,令人目不暇接。

你想当官吗?如果有了钱,当官也容易。你想成为富翁吗?当了官,成为富翁也不难。权钱交易算什么,杀人都可以不偿命了,有钱就行,有人讲情就行。蒙来蒙去,这场热闹非凡的剧目蒙的是不动脑筋的观众,蒙的是善良无知的老百姓。

我们真正向谎言开兵见仗的时机到了,我们的民族已给谎言折磨得千疮百孔,我们该清算一下了。我们已忍无可忍!

还真为真,识假为假。相信“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”不是一句谎言。

积淀已久的谎言累积如山,沉重如磐。我们欲彻底清除谎言,塑造清新的世界,肯定不是一时一地可以完成的。要彻底剔除这一民族文明史上的毒瘤,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,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,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,实

事求是,使现代化的文明程度不断加固,使谎言无隙可入,
彻底灭绝!

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吧!

第一章 官场谎言

一 某些政府要员：如何散布谎言？

来自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，各种方针、政策，通过各种传播媒体，进入千家万户，我们根本用不着怀疑它的真实性。

中央精神首先进入省城，在省政府里提出具体执行方案以后，再进入地区、市里。我们也用不着怀疑省政府的方案。

一个国家的兴盛与京城紧密相连。谁进入国家的高级领导层，都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，方兴未艾。

所以，有关弄虚作假和“谎言”的谈论，我们就从地区、市里，这一阶层谈起。如果说“作假”，这一级的责任不容推卸吧？

两年前，河南省周口地区行署专员——据说是曾国藩的第七代曾孙曾锦诚——以各

种名义,贪污受贿几十万元,被绳之以法。因为他的事情有了定论,百姓们的怒气也已平息了,这里就不多论了。说多了,就说成了“腐败”,似乎离“谎言”远了点。地区、市一级要员,某一天被揪了出来,犯了事,大家才明白了原因一二,而在他们招摇过市、前呼后拥时,谁会了解他们正在欲盖弥彰,做着有损政府和人民的勾当呢?

下面是《南方周末》1998年11月提供的信息,题目为《书记专员突击签字调人机构膨胀积重吃饭财政》。讲述的是山西省忻州地区疯狂批发“皇粮”的事情。这几年卖官鬻爵的新闻已屡见不鲜,但像忻州这样的,在中国都属罕见。山西是个穷地方,忻州又是该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。这么个穷地方,老百姓和吃“皇粮”者的人口比例竟高达27:1。这样的地区怎能不穷上加穷?

贫困地区竟然创造了一项全国记录!

若论及忻州事件,我们有必要举个同例做做参照。1998年6月,辽宁省委召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的“两长会议”。铁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志成预感到自己要被分流,当天便风尘仆仆赶回市里组织讨论,一气呵成地决定了23名干部的任用。第二天一早,他在赶回沈阳开会以前,又交代在家的党组副书记主持会议宣布任命决定。省委在“两长”会议上明确宣布严禁干部分流过程中突击提干,但吴志成置若罔闻,当天下午又回铁岭,签发了任命决定。

为什么这么急?莫非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吧!

请看报道:

1998年春节刚过，忻州地直机关的不少干部回到单位上班时，惊讶地发现周围增加了好些新鲜的面孔，据了解，那些人都是在春节这一段时间内突击调进来的。

本来人员就严重超编的地直机关、事业单位缘何突然大批调进人员？原来，山西省在机关、事业单位推行“控编进入卡”制度，实行编制“一支笔”审批办法，即一个地区的人事权由一把手直接掌握。今年初，忻州地区党、政领导机构面临换届，就在这时，当时的地委、行署主要负责人竟滥用控编权大量突击批签“调入”手续，致使数百人迅速挤入了地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。据山西省委组织部调查，这批调入“新人”中有相当一部分不符合有关规定。

这场突击调入风波从去年发生至今已过去大半年，尽管省、地有关领导几次表态要做出严肃处理，但目前仍没有人被清退。当初签批调入手续的原地委书记刘增宝已调到大同市工作，原行署专员李英明已调回省计委就职。据悉，山西省委领导曾有批示：“谁批准，谁清退。”但忻州百姓认为，这两位签字人都已不在忻州，要让他们再返回忻州进行“清退”，很难。

改革开放二十年了，谁还不明白地区领导一换届，就要刮起一股突击调动潮？忻州的调动风潮从1997年年底开始了。直到1998年4月3日新的地委领导庄严宣布“冻结人事”，这股歪风才被刹住。

据统计，从1月1日到4月3日，忻州地直党政机关及

事业单位共调进 265 人,其中不符合有关规定的 169 人。在这 169 人中,工人 38 个,干部 68 人,学生 63 人。

具体情况有这几种:企业进机关的 5 人,企业进事业单位的 23 人,事业单位进机关的 9 人,事业单位内部逆向流动的(即从自收自支和差补事业单位调入金额事业单位)17 人,从基层县市调入地直单位 38 人,由外地调地直单位的 14 人,还有学生毕业分配进机关 3 人(未经人事部门录用考试),进已满编的事业单位 60 人。这些人中,经原地委书记刘增宝批准的 53 人,原行署专员李英明批准的 52 人,行署人事局批准的 1 人,地区学生分配领导小组批准的 63 人。但是,这个“学生分配领导小组”尽管组长由一名副专员担任,但最后仍要由专员签字同意才算有效。

一时间,希望分配进好机关的人各显神通,目光瞄向“一支笔”,奋不顾身跑批条。

九十年代初山西就开始实行机关、事业单位“控编进入卡”,凡进入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必须先拿到一张至关重要的“控编进入卡”,而这张“卡”则由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管理并发放。地(市)、县编制委员会主任由专员(市长)、县长兼任,实行编制“一支笔”审批办法。

就连忻州地区人事局局长都这么解释:“从制度上讲,只有专员批准后,‘编办’才发放调动的‘绿卡’,但在实际执行中,因为党委领导政府,所以地委书记签了字我们同样要办。不管谁办调动,只要你手上有书记或专员的批示,我们绝对一路绿灯。”

这股忻州历史上罕见的“跑编制风”在1998年3月份

达到了高潮。当时，刘增宝和李英明因公事都住在太原，因此，一批又一批人坐着公车从忻州跑到太原去搞“批条”。一旦来人拿到批条，马上去找人事局长，要他签字同意办手续。人事局长家门庭若市，白天晚上都热闹。

到4月3日，新任地委书记宣布“冻结人事调动”时，仍有不少人拿着批条到人事局。等他们得知这一切都成了“谎言”时，傻眼了。

调动成功的人，有的进了地委、行署大院（主要是调进秘书处），更多的则分布在各个地直局，重点是一些社会上公认的“好单位”。文凭专业全不管，至关重要是关系。有的人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，却进了专业知识比较强的单位。

忻州地区地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原本就超编严重，1997年底实有人数突破万人，超编820人，其中党政机关超编700人，事业单位超编120人，而现在继续调入人员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
新的班子面对这一沉重包袱，为难地说：“这二百多人，实际上扯着上千甚至更多的人，要清退，太难了。”

这正是：机构未简先添肿，吃饭财政根难除。

超编，意味着什么？谎言变成了真实，加重了财政负担，增加了人头费开销，变相加重了企业和农民的负担。由于地区财政对一些事业单位采取了“人头经费”包干的办法，所以这265人中由财政直接发放工资的有一百余人，而其他吃掉的则是各单位的“事业费”。这些开支最后实际都要由企业和广大农民去承担。这种话又不能张扬出去，只好变个方式去说明。也就是向企业和百姓说谎。

忻州全区 14 个县中有 10 个贫困县,280 万人口中“吃皇粮”的就有 10 万多人,平均每 27 个老百姓养活一名干部,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。全区财政新增目标 8000 万,但照眼下出台的干部增资政策(当然也包括新进人员的开支)就需增加支出 7900 万元,仍旧是“吃饭财政”。

如今在忻州流传这样的顺口溜,讽刺“卖官”“卖编制”:

“几千块钱挂个号,一万元能买张表(指领导指示的调动表),要想工作调动了,还得再送再多跑。”

“吃饭财政”本身就是各种谎言造成的,每年的经济增长点都在扩大,每年的财政收入都在提高,而其实是原地踏步。

朱镕基总理说过:“政府机关庞大,把财政吃光了,成为吃饭财政。”

由财政供养人员、吃“皇粮”人员,到 1996 年底,全国已达 3670 万,相当于加拿大全国人口。每年要吃掉 3700 亿元。每 30 个中国老百姓要养活一个官。

忻州事件的主要人物刘增宝、李英明尽管这样无视政府用人制度给政府造成了巨大麻烦,但他们却很幸运,没有因此丢掉“乌纱帽”,而且还有“谁批准,谁清退”的权力。

在刘增宝他们疯狂批发的铁饭碗中,可能没几个带长的职务。但他们既能垄断“一支笔”,连普通公职都可以根据亲疏利害随心所欲地批发,不更能说明其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吗?他们该如何向群众交代?

这是支什么样的笔?这支疯狂批发“皇粮”的笔,不但已经造成了吞噬忻州百姓血汗的恶果,还因公职人员的滥

竿充数，必将不断给忻州人制造更多的恶果。所以现在的实质问题就是能否彻底清查清算在这起疯狂批发“皇粮”事件中的腐败事实。忻州人显然不能指望刘增宝等人良心发现、自查自处。而且谁又敢保证有过“顶风作案”纪录却未受惩罚的刘增宝等会不会再次运用获得“清退”的权力塞进许多私货？

刘增宝等人敢于“顶风作案”，对此不必惊奇。这些人根本不把国家的机构改革大政放在眼里，并非是愚蠢得要以“顶风”为乐。他们“不幸”栽了，也多半是运气欠佳，对风势、风向判断有误而已。

他们之所以能“顶风”，靠的是什么？他们可能比任何人都知晓这样做的后果。但他们会向上级领导说谎，也会向群众“解释”。有了说谎的本事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就都能找到合理性了。

人们尤该清醒的是，不要为那些顶风作案的人栽了而对“风”情有独钟。因为精兵简政之风的缘起，不过是机构臃肿的必然结果，二者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。“顶风作案”核心是“作案”，而不是“顶风”。事件性质是“案（纪）”决定的，而不是“风”。如果机构改革方案不出台，刘增宝等人或许没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“紧迫感”，从而也可能表现得不那么疯狂。但这号人既然垄断了“一支笔”，在平时无“风”的情况下，不是同样可以根据亲疏利害的原则，不露痕迹地从容“添丁”么？这种情况显然更为普遍也更难对付。

刘增宝等人，无论平时从容添丁也好，还是在风头火海上作案也罢，都不过是缘于没有健全的人事制度的强力约